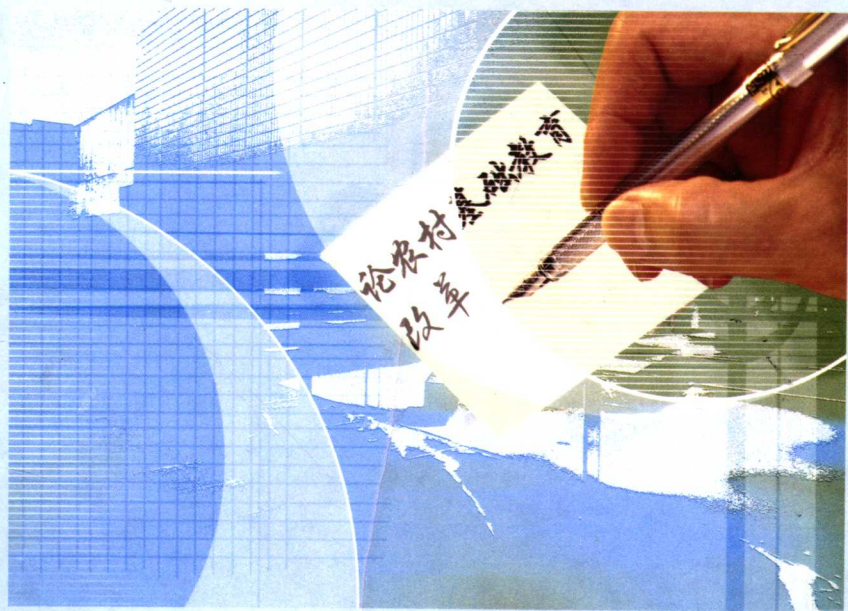


中国教师文丛

论

农村基础教育 改革

● 萧 垠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

萧 垠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萧 垠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4

ISBN 7 - 5034 - 1507 - X

I . 论 … II . 萧 … III . 教育—教学研究—文集
IV . G63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312 号

责任编辑: 方 正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 110113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 字数: 216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150.00 元 (本册定价: 18.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萧垠，原名谢光瑾，中共党员，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24年3月生于河南孟津。194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1948年参加革命。曾工作于北京市教育局、中央教育部、山西省教育厅。1980年后任山西省教科院教育理论研究室主任、《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主编。承担和主持过“65”国家重点、“75”部委重点教育科研项目。社会兼职为全国教育学会研究会、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等。

序 言

1946年11月，我在上海《时代日报》发表过一首小诗《他们说我疯了》。原稿早已不存，但大体上依然可以追记如下：

他们说，我疯了，
无非是我爱穿草鞋走路，
而且是北京长安大街的路。
草鞋，妈妈编的，战友编的，我自己编的；
从小穿着它，淌水，上山，下地，
走起来快得像只小鹿。
草鞋，金黄色的稻草编的，
它飘着稻香，
吹拂着我勇敢前进，
吹拂着我走上千里征途。
妈妈，我永远牢记你的一再叮嘱：
向着光明，向着进步！
草鞋，在月光下，在间歇中，
我还会一双双编织；
让他们说我疯了吧，
我将永远豪迈地走自己的路！

1983.9.1 追记

这首小诗的发表，真有点像是我的人生宣言，也真有点像是我和农村的不解之缘。

发表这首小诗的那年冬天和以后，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和同志们一起，一如既往地置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在义愤填膺地参加过“抗议美军暴行”、“‘五·二〇’、‘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一次次向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出坚决战斗的呼号以后，由于已不能在北京存身，我和同志们辗转走向了日夜向往的革命根据地。从那时起，我这个从小穿草鞋的孩子，又从大城市走到了辽阔的农村大地。1949年初，在解放北京的炮声中，我从解放区又进入北京搞接管时；1958年，我响应号召，参加中央机关干部第一批劳动锻炼，从北京下放到一个山区农村那一年；“文革”中的1970年，又是连续两年下放到一个更偏远的山区农村插队锻炼时，我还是恋恋不舍地带着几双草鞋下去，这让北国的山里人感到很新奇。这是我对农村的感情，对人生征途的不忘，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还需要解释么？

熟悉我的同志们都知道，我参加中央机关干部第一批劳动锻炼后，就地下放到了那个山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80%以上的省里，一直在省的教育部门工作了几十年，先是在一个杂志社任编辑和记者，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到基层去采访和调研，这就有了更广泛接触农村和农村教育的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又调入省里的教育科研机构工作时，曾一再思考：选什么科研项目呢？我比较熟悉的教育实际是什么呢？我究竟能在教育科研的哪个领域可以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呢？由于我和农村一直有着不解之缘，由于我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很自然地重点选择了中国农村教育研究这一领域，并决心终生献身于农村教育研究而无悔。这样，在我的一生中，除了

感情上和农村有着不解之缘外，就又多了一个和农村教育研究分不开的不解之缘。

1988年4月11至26日，我有幸应邀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世界平民教育和农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史也是国际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当年已95岁高龄，不顾长途飞航之劳，特地从纽约飞到马尼拉，为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先后五次作了关于农村教育和农村改造的学术报告，并盛情接见了我们几个与会的中国教育学术界人士，还特意与我们几个合影留念。在这次研讨会上，晏阳初先生以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最新概括，以饱满的热情，在他的第五次报告中，明确提出农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十大信条是：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以表证来教习，从实干来学习；不是装饰陈列，而是示范模型；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不是救济，而是发扬。晏阳初先生还一再强调，要通过文化、生计、卫生、公民这四大教育，培养广大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人，并主张采取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方式，系统整体地将农村教育和乡村改造全面进行下去。这些极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听了晏阳初先生那五次珍贵的报告，并实地参观了晏阳初先生在菲律宾建立起来的几个农村教育与农村改造实验示范基地，使我正在主持的“七五”部委重点教育科研项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与效益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着深刻的启发：①搞科研，特别是搞关于农村教育的科研，必须满怀对农村和农民及其子弟的深厚感情，深入实际，眼睛向下，

诚恳向农民和基层干部学习，认真听取他们的经验与建议，不断总结他们有创造性的新鲜经验，像晏阳初先生那样，广交农民朋友，实实在在搞调查研究搞实验，切不可在农民和基层干部面前摆那种“做学问”的架子，而要甘当小学生。②搞科研，就要全神贯注，以献身的精神，把它当作毕生的事业去做，像晏阳初先生那样，七八十年献身于农村改造与农民教育而无悔，而不能浮光掠影地满足于蜻蜓点水，更不能只是为了猎取个人名位，抱着不可告人的个人打算去搞。③搞农村教育科研，就要像晏阳初先生那样，把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用大教育观与系统论思想，整体地看到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紧密联系，看到它的各个因素构成的整体性系统性，而不能孤立地就教育谈教育。④搞农村教育科研，必须特别重视以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的实验为基础，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教学的比较，以至不同城乡的比较，如晏阳初先生所强调的那样：“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既不能空泛地引文论证，也不能盲目照抄现成材料，而是要强调以事实、以实验过实践过的事实为根据。受到这些启发，使我更加明确，在搞重点科研项目时，精心规划、组织了一系列的县、乡、学校调查，还在山西、河南、江苏几个省进行了不同的典型实验，极大地增强了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对“七五”部委重点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与效益的研究》的鉴定，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是一项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从总结农村教育的历史经验出发，探索其建设和改革的规律，特别是针对当前困扰着人们的若干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确有某些独到之处，……很有参

考价值，是当前教育科研成果的一个巨作和力作。”这一评价对我这个主持人和参加这一重点研究项目的所有同志，无疑都是有利的鼓舞与鞭策。

这个集子所收录的，绝大部分均见于已出版的书刊中，这里不作一一介绍，但要从总体上就教育思想这一根本问题做些强调。农村教育包括其基础教育的改革，必然全面涉及管理体制、学制、课程与教材、教学方法的一系列改革，也必然涉及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改善与教学设施建设、师资力量与领导水平的提高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根本至今仍然是教育思想的改革，是全面进行国民素质教育，还是依旧进行升学与应试教育？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思想障碍，要使农村教育积极适应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依然十分困难。当前教育思想上的最大弊端，就是基础教育中的应试与升学教育这一有害倾向，而不是国民素质教育。清朝末年的新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性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进了我国旧教育的改革。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国的农村教育改革，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但教育思想改革上的突破性进展，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严重认识到我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国民素质教育，而不能再是应试与升学教育。实践证明，我们的大量调查与实验的事实说明，只要彻底改革教育思想，我国城乡的基础教育，必将以崭新的、有着中国特色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最后，我想稍微多说几句，谈谈我是怎样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还孜孜以求地坚持农村教育研究的。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点连我自己在过去也弄不清楚的背景。

1955年5、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当时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国家单位，也开始了

“反胡风”运动，我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严格隔离审查。这的确是一场风暴。在历时七八个月的审查中，我被停止工作，也不能回家，除写“交待”材料外，还接受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对我的批斗会，让我交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我怎么就成了这样一个重大嫌疑犯了呢？这要说到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参加过的文艺活动。1947年春，我曾参与创刊并在初期作为主编者之一，编辑出版过一个文艺刊物《泥土》，这个刊物的第二期上，开始发表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作家舒芜写的《论五四精神》，在以后的第三期到终刊的第七期上，更是较多地发表过路翎、绿原、方然等的作品，这当然在劫难逃。当时，我虽是一个8级编辑，但负责一个编辑室，还出版过几本书，人们自然对我另眼看待。《泥土》是北师大和北大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因追求进步文学而办起的，他们中间除地下党团员外都是进步青年，最初只有十几人，经费由大家共集，北师大方面拿出的，是校方发给学生的师范生制服津贴等，也向个别进步教授募捐过一点。我在《泥土》第一、二期上发表过两篇杂文，一是《救救孩子》，一是《垮的日子》；此外，在大学读书那一段，有数地的一些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散文、杂文和评论，只是热爱文学而已。1947年夏，我离开北京，辗转去了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就再也没有在《泥土》上发表过什么。在北师大读书那一段，经丁易教授介绍，我和几个同学虽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平分会为会员，但接触的也只是朱自清、许德珩、马彦祥、焦菊隐、李荒芜、丁易等先生。《泥土》第二期上之所以发表舒芜的《论五四精神》，我还是迟到2003年初，才从《泥土》的前期主编之一的叶遥同志那里了解到当时的背景。叶遥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她有一个同系同班同宿舍的女同学陈沅芷，当

时正和舒芜谈恋爱，通过陈的关系，叶遥向当时已是文化人的舒芜约了《论五四精神》一文并登在《泥土》第二期上。1956年后半年，最后给我做的结论中，明确指出我参加编辑的《泥土》第一、二期是进步的。整个结论基本上实事求是，按说我应释下重负，但为什么几十年来仍时常感到压抑呢？就因为政治上常常莫名其妙地被人看作“另类”而被投以异样目光。同时下放的有些是“摘帽右派”，我虽然结论上没什么“帽子”，但的确听到背后议论，有悄悄说什么我是“胡风分子”的，有无缘无故向我施压的。这样的氛围，实在让人受不了，总觉得有点冤，但又不知是怎么冤的，精神上就舒展不了。这一直迟到2003年1月，原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工作过的叶遥同志，才告诉我知道了形成那一重大历史冤案及我等受牵连的历史经过。叶遥于1997年11月29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41期上，发表了她写的《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它》，详实地记述了这一历史冤案的如何形成，还沉痛地负责任地说了她在这一冤案中应负的责任。这样，我才知道了这一历史风暴的背景，虽然我知道的太晚了一点。

据叶遥的那篇回忆录所载，1955年春，《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同志要当时在文艺组工作的她去找舒芜，约舒芜写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的宗派主义的文章。舒芜答应并写好《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同志要叶遥再去找舒芜，借阅舒芜所写文中提到的那些胡风给舒芜的信，以便在发表前校对原文。借回这些信以后，文艺组的负责同志感到事关重大，就将舒芜的那篇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上级主管负责同志逐级审阅，岂料舒芜那篇文章的题目最后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中间舒芜又修改过一次），此后由人民出版社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时，舒芜的

那篇文章的标题，最后又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叶遥是奉命约稿的，最初是为了批胡风的“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她也是奉命前去借阅那 100 多封胡风给舒芜的信的，她自己也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最后结果。叶遥回忆此情时自责：“‘我在这一冤案中应该负什么责任’？光说‘奉命组稿’，良心上说不过去。虽然我的确没有存心害人，这是实话。但过失也能害人，能不承认么？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读了叶遥寄来的那篇回忆录和来信中的几点说明，我才终于弄清了“胡风集团”冤案的形成，弄清了《泥土》以及我们初创并编辑过《泥土》的同志们是怎样受牵连的。这一冤案已成历史，而且党在 1980 年、1985 年两次对过去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已从政治、历史、文艺思想进行了彻底平反，但我过去被有的人以异样眼光看待时受压抑的心情，确实久久难以平复。我之所以在这里写出这一令人沉痛的回忆，是要告诉至今仍很关心我但又弄不清什么原委的同志们，我是由于什么背着沉重负担从事工作的。可以告慰同志们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去，我以坚持的努力，还是在逆境中对党对人民做出了应有的微薄贡献，实现了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时的誓言，回首往事，但感无愧。

最后，我按捺不住自己跳动起来的不平静的心，还要对几位一直关心并鼓励我向前看的同志说几句。在我怀着压抑的心情下放期间，吴伯箫同志借出差开会之机，两次看望我，热情地鼓励我积极对待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仅不能发生不应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要开创性地做好工作，无愧于党地做出更好成绩来。而他是冒着有人说他“右倾”来看望我鼓励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大批下放干部因落实政策可以回京工作时，当时在中央教科所主持工作的刘松涛和郭林同志力主调我

回京，并由组织上两次发出调动函；如果不是我当时过多考虑身体多病，肯定是要成行的。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们对我十分关心，我将永志不忘。郭允昌同志是我在省里的一个杂志任编辑时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他力排非议，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大力支持我，使我能以大胆工作，信心百倍地写出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农村教育调查，他的正直与道义之情，至今也久久难忘。李瑜同志是我青年时期的患难战友，当我于“文革”期间，又一次下放山区农村插队时，她除了一再鼓励我好好锻炼并注意身体健康外，还远从南方给我寄来她节省下的粮票让我用，寄来珍贵补品让我用，可惜她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就告别了人间，未能看到她经常挂念的我，至今仍在孜孜以求地执着于科研工作。吴伯箫等同志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头。还有当初共同创刊《泥土》的祝宽和于承武同志，他们一直在鼓舞我排除一切干扰，努力做出奉献，他们在逆境中著述等身的拼搏精神，对我有着强有力的感染，对我有着极大的鼓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一直关心我的同志，我也将永远地怀念他们在心头。

萧 垠

2003.11.20

目 录

山区教育结构及发展的研究

——“六五”国家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之一 (1)

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和现状探讨

——“七五”部委重点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提高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研究》之一 (49)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显示模式

——“七五”部委重点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提高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益的研究》之一 (131)

关于农村教育的系统整体性问题 (163)

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与实验方法的现实意义 (177)

开发“脑矿”使农民具有“四有”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评介一二 (188)

当前国民素质教育的若干问题(纲要) (199)

教育规律的几个问题 (215)

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是要削弱智育 (225)

传统教育思想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 (229)

对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都应实事求是 (235)

当今教育思想变革趋势 (243)

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 (251)

山区教育结构及发展的研究

——“六五”国家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之一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非常显著，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但是，我国农村教育的落后局面还没有一定的突破，极不利于现代科技知识向农村传播，不利于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也不利于那里的精神文明建设，极大限制农村的发展。要打开这种局面，就要切实按照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农村教育进行整体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强化职业技术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在深化改革中提高质量、增强效益。

在我国农村中，广大山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现在还有不少属于不发达地区。我国山区包括山地、高原、丘陵地区在内，占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69%，地区差别很大。如果山区经济和山区教育能和比较发达的地区协调发展，我国农村的落后局面将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山西的山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为了说明一些问题，

本研究将主要地根据山西的情况，对山区教育的合理结构及发展进行一些探讨；同时，将结合提出关于山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上如何对贫困山区实行特殊政策问题。

(二)

一切物质都有它的内在结构。从本质来说是农村教育的山区教育，也有它一定特点的内在结构。可以把这种教育结构称为山区教育结构。

经济结构是影响国民经济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有了适应经济结构的教育结构，才有教育结构上的合理构成和比例关系。山区教育结构的合理与否，根本在于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各种教育构成之间、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之间质的组合与量的比例，是与山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还是不协调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还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在于它是否适应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充满自身的活力，从而促进山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山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般来说，优化的教育结构的建立，客观上有着它的内在规律：（1）各种教育能整体地得到协调发展，有利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专业的大专和中专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使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能比较合理地发挥师资力量和教育投资的作用，充分开发和利用智力资源，取得教育的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既有利于加强基础教育，又有利于强化劳动技术教育，有利于全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较快提高。总之，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使教育能从整体上

得到协调发展并能实现良性循环。

全国要有一个合理的教育结构。各省、市、区的教育结构是全国优化教育结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山区的优化教育结构又是各省、市、区优化的农村教育结构的一部分。从这一个巨大系统工程的良好循环要求来看，我国现在的山区教育结构，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不合理的状况。以下主要地就山西的情况作些分析。

一、现有山区教育结构，未能为充分发挥山区工业资源优势服务，形成自有特点的工业职业技术教育构成。

山西这个大部分为山区的省，它的经济总体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优势型的经济结构。在山西省土地面积 15.66 万平方公里中，含煤面积就达 5.71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6.44%，分布在 78 个县（市、区）境内，占全省 118 个县（市、区）的 66.1%，探明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原煤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强。^① 此外，还有八十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不少是占全国第一到第四位的。仅煤炭的预测总埋藏量就达 8,600 多亿吨，为探明储量的 4.2 倍。^② 山西的资源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结构必将逐步成为全国少有的重型结构（即煤炭工业及其它重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超过 60% 以上）。据《关于山西省一九八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山西省 1984 年的原煤产量达一亿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吨，其中地方矿（含乡镇煤矿）就完成一亿零六千四百七十万吨。乡镇煤矿是一个非常富有活力的产业。单就

① 《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开发研究》第 764 页张维强著文《煤炭开发与城镇建设》

② 摘自《基地建设研究》